网络文学历史题材书写的新高度

——简评蒋胜男新作《天圣令》

□陈崎嵘

历史题材创作历来占据中国网络文学的重要位置，而蒋胜男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创作的《芈月传》《燕云台》等广获好评，与此同时，人们也对她报以更高的期待。最近，由其创作完成的长篇历史题材小说《天圣令》就令评者眼前一亮。

在笔者看来，就总体而言，《天圣令》的思想性、艺术性、真实性、可看性已超过了蒋胜男先前所创作的历史题材作品，实现了其创作上的新收获、新突破。作品达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网络性相统一的新高度，抵达了网络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学传统、主流审美相融合的新高度，是网络文学历史题材作品足以与传统文学历史题材作品相媲美的新高度。

那么，蒋胜男的《天圣令》给读者和评者究竟带来了什么呢？笔者有如下两点看法：

一、作品体现了正确的唯物史观，在典型的历史环境中塑造了典型的历史人物。《天圣令》写的是宋代太宗、真宗、仁宗三代帝王的统治史，以及女主刘娥经历千辛万苦蝶变为宋朝执掌朝政的垂帘太后的故事。其中自然不乏社稷之争、朝野之争、宫斗之争。作家的高明与可敬之处不在于其感性细致、娓娓动听的叙述，而在于透过这些表面之争写出了宋代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写出了底层百姓的民不聊生、揭竿而起，写出了国力衰弱、外敌环伺、山河破碎的惨景，写出了封建帝制本身固有的软弱与腐朽、弊端与不堪，写出了最高统治者的苦心孤诣与无能为力，好似一幅宋代封建社会的政治全景图，不仅勾勒出赵宋王朝的四梁八柱、通衢大道，而且还细致入微地刻画出了它的骨骼脏腑、肌理脉络。特别是书中关于“澶渊之盟”的描述，真实、客观、多角度地描写了宋辽双方在综合国力、军力、民力、帝王和将士心理诸方面的状况，加上彼时自然环境条件的特殊性，揭示出“澶渊之盟”的必然性、可行性、可信性，使读者看到了偶然中的必然，体认到这是宋辽双方社会经济军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双方执政者心理博弈的最终结果，使得作品具备了史家的识见，经得起人们的追问和史实的检验。作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按照其要义进行历史题材创作，在以“穿越”“架空”“金手指”“异能”为常态的网络文学界，这样的创作态度和创作实绩尤为难得。

二、作品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性格鲜明的宋太后刘娥的艺术形象。蒋胜男是一位擅长描写“大女主”题材的网络作家。在《天圣令》中，如何超越以往是蒋胜男面临的一个课题。刘娥从一个生活最底层的逃难民女，崛起为执掌最高权柄、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太后，其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具有他人不可比性。值得高兴的是，在正史资料极度匮乏、民间野史传说纷纭中，蒋胜男以自己超凡的虚构能力和叙事语言，写真、写活了刘娥。人们从书中的描写可以捕捉到人物“成长”的六大因素：

其一，刘娥与宋真宗的偶然邂逅及后来爱情际遇的演变。在桑家瓦肆与王子赵元休的相遇是刘娥演变的起点。来自民间、经历苦难的刘娥，有其他少女所不具备的光彩与气质。刘娥爱对了人，之后步步为营，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作家准确地把握和出彩地描写了这种特殊的变化着的帝后爱情。始于纯洁之爱，中则无奈相爱，继而爱与权各半，最终演变为重权轻爱。这是帝后走向权力巅峰必然呈现出的爱情弧线，也是帝后之爱、之情的真实写照。

其二，宋真宗的软弱无能和依赖心理使得刘娥自觉不自觉地参政成为一种习惯。二人一改历朝历代“后宫不得干政”的古训，宋真宗每有疑难，刘娥则总有良方。宋真宗体力不济，欲罢不能，刘娥却精力充沛、记忆超群，两人形成了朝野皆知和认可的参政模式，这为刘娥后来的垂帘听政打下基础。作家描写的这个过程是真实、自然，也是可信的，使得刘娥这个人物形象有了历史依据。

其三，刘娥的治国理政之能。刘娥虽出身寒微，但天资聪颖、刻苦好学、领悟力强，在参政议政中逐步掌握了驭臣之术，从后宫脱颖而出。她深知，治理天下须得君臣调和、五行相济。朝中既需要能臣、直臣，也需要“中和”之臣与“心腹”之臣。帝后的职责只在维系其平衡。面对朝臣间的矛盾，她折冲樽俎，调和鼎鼐，维护皇家权威，为自己坐定皇后之位殚精竭虑。《天圣令》中写道：“深宫后院的孤儿寡母，从二月份真宗驾崩，到六月份解决丁谓，从名义上拥有天下到实际握有天下，文武百官，俯首听命，从此无人敢逆太后之意，仅仅用了四个月。”又譬如她亲授定王以超常名位，又出示定王联系王妃顺容的玉佩，恩威并用，迫使八王爷收敛野心。这些令人不能不惊叹其出色的治理管控能力。

其四，刘娥对底层生活的了解和对社会大局的把握。刘娥是从蜀中难民队伍中出来的人，对底层百姓生活的艰难与不易有着刻骨铭心的亲历体验。她利用两代君王手中的权力和自己的影响力，尽量采取一些于民有利、于国有益的政策。如她执掌权柄后发布的《天圣令》等，客观上有利于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推动社会对立面的缓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

其五，刘娥抚育教导宋仁宗成为“千古仁君”。她将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治国安民之术自幼灌输给宋仁宗，严格管教，身体力行，使得后来宋仁宗成为一个“好皇帝”，继而开创了可与“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相提并论的“仁宗盛治”。这也许是刘娥作为历史人物对宋初年代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史书及后人称誉这位皇太后的主要原因。

其六，刘娥既倔强又能忍让的个性。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决定形象。刘娥的个性是倔强、坚毅的，她不怕难、不畏死，从小敢想敢说、敢作敢当。个性成就了她的与众不同，造就了她异于常人的底气、格局、视野与胸襟。当机会来临时，她能勇敢站出来，不惧天下诽谤，朝议汹汹，临退前还要穿上帝服祭拜，就是最好一例。她要明明白白告诉天下人，这帝位我非不能也，而是不取也。同时，刘娥又是一个识时务者。她可以同意宋真宗的“金屋藏娇”，不要名分，面对飞扬跋扈的郭皇后时处处避让，委曲求全，自知封后条件尚不具备，便主动上表辞谢。正是这些忍让与退让，反而让她获得好名声，最后使她登上权力巅峰。之后，她运用手中权力做了一些符合历史发展进程、有利国计民生的事情。故史家点赞刘娥“有吕（后）武（则天）之才，无吕武之恶”。

《天圣令》对上述六大要素的描写与刻画是全面的、生动的、细致的，艺术的。六大要素的融合和交叉、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成就了刘娥独特的丰满的人物形象，也成就了《天圣令》这部作品。如何进一步修改这部作品，笔者也有两点建议：

一、关于《天圣令》的书名。“天圣”是刘娥垂帘听政的年号，又是颁布宋律的名称。现在有点一笔带过的感觉，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不够深刻，多少会影响对刘娥这个人物的评价和书名的分量。建议可否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章？

二、对刘娥早期的心理转变和情感变化描写显得过于简单快速，在韩王赵元休（即后来的宋真宗赵恒）的请求下，刘娥很快表示愿意跟他回到府中，这里可能还应有一个思考、矛盾纠结的过程。因为，她与义兄刘美在逃难途中结下了生死之交并已芳心暗许，很可能会成为刘美的妻子。赵元休固然比刘美更可爱，但她对刘美没有一丝留恋和愧疚吗？把这个思考、比较、矛盾、最终选择离开的全过程写出来，人物会显得更真实可信，也更能凸显主人公复杂、丰富的情感世界。

文化情怀与文学自信

——评姑文的《琉璃世琉璃塔》

□汪 政

姑文的秦淮故事系列的纸质本陆续出版了，这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以一种新的方式走进了新的读者群，在此之前，这一系列作为网文已经受到了许多读者的追捧和好评。

并不是所有的网文都适合再以纸质的方式出版，多数网文在从网络文本变为纸质文本的过程当中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不管是篇幅、内容、结构还是文字都是如此，毕竟两种媒介面对的是不同的接受群体，其阅读期待和审美趣味差别还是较大的，但是姑文的秦淮故事则试图走一条中间道路，她努力在这两种不同的文体当中寻找共同点，也努力满足两类读者群的阅读需要。虽然姑文的写作历史并不长，秦淮故事系列迄今的尝试与成功还只是一个个案，但即使如此，她所提供的经验还是值得好好研究的，因为从更高的层面来看，不仅仅是网络文学与纸质文学，即使是不同的艺术门类，它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共通的东西的，所以关键还在于如何写，如何激活读者心中被遮蔽的处于休眠状态的审美欲望，不是过多地强调差异，而是通过更普泛的元素激发起读者更广泛而深刻的审美认同。

就以姑文的第一部《琉璃世琉璃塔》（以下简称《琉璃》）来说，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她的纸质文本，但是去看看当初它作为网文所引发的评论就很有趣，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当时那种生动的接受状态和作品与读者的互动情形，更可以看出姑文对读者的引导与激发。许多读者是带着网文的阅读定势、自我的阅读经验和网络历史玄幻小说的模式去追读《琉璃》的，一开始他们确实有一些不适应。读者们读得很细，从作品的题目到内容提要，再到章节的展开和叙事的节奏，都提出了许多建议。不少读者一方面被作品的人物与语言所打动，另一方面又不无惋惜地指出它与许多成功的历史玄幻作品的差异，希望姑文能够听取意见予以借鉴。但是随着作品章节的不断推出，许多评论的“画风”渐渐发生了变化，读者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跟上了姑文的节奏，完全进入了作品，也不再纠缠于作品与一般网文的区别，并且渐渐认同，最后完全被征服。

总结下来，当时读者对网文《琉璃》赞赏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作者对明史所下的功夫。网文读者中有不少研究过明史，而且专门追捧以明史为题材的网文，甚至以明史为表现内容的其他艺术门类。这部分读者对这部小说一开始是很苛刻的，但是后来也开始佩服姑文的专业精神，不仅仅是明朝历史的沿革，明朝的对外关系，甚至同时期的高丽朝鲜史、日本史、北方少数民族史，姑文都做了详细的案头准备。这些复杂而专业的历史知识，经过姑文的文学转化都了无痕迹地融入了作品的叙述与描写当中。二是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从明太祖朱元璋、明惠宗朱允炆、明成祖朱棣，到重要大臣、内宫人物、佛界高僧，直到一些市井人物，都刻画得个性鲜明。读者对其中的女一号莲花情有独钟，这个人物重情重义，几乎从一出场就得到了读者的追捧，她的命运一直牵挂着读者的心，他们纷纷为姑文支招：莲花该往何处去，她的命运到底如何，她爱情的高点应该在哪里等，诸多的阅读期待紧紧地吸引了读者。再一个就是作品的语言。该小说文字简洁、生动、清闲雅致，非常富有韵律感，姑文很注意叙述语言、描写语言、人物语言之间的区别，这也令当时的读者赞不绝口。

说实话，就这三者而言并非网文的强项，它们本身也不是网文所要追求的审美目标。在穿越与玄幻中，网文无需为历史负责。在人物塑造上，网文注重的是人物的类型化而不是个性化，因为只有人物具备类型化才能在浩瀚的篇幅中不至于被淹没，并且以其类型化的“功能”驱动故事的发展。至于语言，网文一贯是以降低文学性和阅读的难度来迁就读者的。如此看来，我们可能过多地强调了网文与文学传统的差异和对立，而忽视了它们之间传承与融合的可能，忽视了网文读者的文学鉴赏力，更忽视了网文作家对读者的引领。《琉璃》刚上线的时候，姑文不可能不了解读者的希望，但是她很坚定地坚守自己的创作初衷，坚守自己的审美理想，在与读者的互动当中，她不但赢得了读者，而且以自己的作品塑造了读者，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也是姑文文学自信的最好体现。

当然，我以为作品最成功的地方是姑文的情怀，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整个秦淮故事系列是姑文对传统的致敬，是她对南京历史的致敬。《琉璃》中的大报恩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它承载的是一个地方的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情怀，也是一个现代人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所寄托的情思。这个故事讲述的中朝关系是中国读者一直关切的话题，以朝鲜开篇，贯穿始终，并将其概括为“东陲厚谊长”，联系到上世纪50年代，使读者理解当年抗美援朝的历史渊源。我想，这些大概是这部作品能够打通网文与纸质版的小说写作，获得不同类型读者喜欢的内在原因吧。

《情暖三坊七巷》：书写坊巷空间里的民间情感

□刘虹利

网络文学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庞大的网文写作群体不仅带来了作品数量上的惊人增长，写作者们的多元知识背景和生活阅历还使他们的作品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和丰富的精神维度上不断生长，尤其在新时代文艺政策的指引和时代精神的召唤下，越来越多的网文跳出了自我书写和蹈空虚构的初阶模式，在经济建设、社会民生、文化传统等题材领域深入开掘，并勇于就重大的话题书写出一代网络原住民的心曲。姚璎的《情暖三坊七巷》正是这样的作品，小说以小的故事呼应大的时代命题，聚焦福州古城三坊七巷的改造历史，探讨在城市化进程中传统如何与现代和谐共生的问题。

在福州，三坊七巷被称为里坊制度活化石。中国城市的里坊制度由来已久，并在政治、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是古代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特殊布局方式。据相关学者的专门研究，隋与唐前期，在都城及大部分州（府）县城，推行了较为严格的里坊制，城内基本空间格局由封闭的坊墙、大大小小的十字街道构建而成。中唐以后，里坊制度逐步解体，封闭式的坊墙逐步被突破，到宋代形成了开放式的街巷布局。里坊制既是一种关于城墙街道、坊市建筑的空间布局，也与安全保障、生产贸易、日常习惯等生活秩序相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里坊制这一特殊的空间实践导致了相应生活方式的形成。

在中国迈入现代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城市规划构造出了新的空间布局，正如美国文化地理学家菲利普·韦格纳所认为的，“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当代空间实践围绕工业生产和资本流通展开，不管是建筑设计，还是空间规划，都体现出社会对于高效便捷和精准定位的功能性追求，这样的城市内部空间，在不经意间就改变了主体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甚至一度使人普遍认为城市是由高楼大厦组成的冰冷的水泥森林，缺少人情味儿，《情暖三坊七巷》的创作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考量而发生的。若论当代都市人际情感纽带的薄弱甚至断裂，人口流动性增大与生活节奏加快固然是主因，但空间布局的变化也不容忽视：工作场所与居住空间的分离、高层公寓楼房的垂直构造，降低了人际互动的频率，使“家”成为原子化个人和核心小家庭的庇护所，“街坊邻里”被“小区业主”的名称取代，“远亲不如近邻”成为过去的故事。

而在三坊七巷这样传统的空间构造中，姚璎试图帮助读者找回失去的情感家园。作者以三坊七巷中的衣锦巷为主要场景，从肉燕传人陈荣顺的日常生活入手，讲述两代人的故事。其中既有陈荣顺与元宵传人林山之间的心结与不睦，又有陈家父子、林家父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还有陈雨帆、林恩馨、潘国明等年轻人之间的爱与哀愁，最终两代人共同努力，消除了误解，放下了恩怨，顺利完成了三坊七巷的古城改造，并将陈荣顺、林山等老福州居民的种种民间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说，小说在故事情节设计上比较中规中矩，如陈荣顺、林山因“三角恋情”而反目，陈雨帆、林恩馨遭长辈反对、恋爱受阻，林恩馨在网络上默默陪伴陈雨帆等，都是“日常”而非“传奇”——历史的长河犹如静水深流，除了撷取河面的浪花，作者更想探知它那精神和情感的河床。

其实，从游客的外视角看去，白墙青瓦、曲径通幽的三坊七巷是难得一见的建筑奇观，其古朴风情与现代都市的红尘滚滚形成鲜明对照，而不管抱着寻幽探奇还是网红打卡的姿态，三坊七巷都只是城市生活时尚中的有限点缀。但对于居住其中的人来说，这一古老的坊巷空间意味着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一致的情感结构。故事中的陈荣顺一家和他的租客们，居住在已有上百年历史的陈家祖厝中。陈家祖厝是三进、两层的公馆式建筑，中间是天井，四围是房间，一楼有大厅、有敞廊、有后院、有小池以及独立的公用厨房。在这样一种合围的空间里，人与人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大厅、厨房、小院等公共区域为住户提供了充分的交流空间，虽私密性不足但互动性极强。在传统中国，公馆里住的是枝叶繁茂的大家族，而在当代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与家庭构造中，大家族的盛况自然少见，因此，作者实际上是借着陈家祖厝里的房东和租客，重构了关于公馆空间里的大家族的生活想象。祖厝里的这些人物形成了一种较为松散的聚集，虽然由租房建立的契约关系有一定的脆弱性和随机性，但公馆空间却促使他们之间产生了某种前现代的情感交互模式，那些隔墙有耳、家长里短、闲言碎语固然令人头疼，但在这一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支撑却也是实实在在的，如陈荣顺日常召集的聚餐、台风天的互帮互助、旧城改造时的团结一心等等，都是现代城市高层公寓式空间中罕有的。三坊七巷与陈家祖厝里的故事，可以说是作者对传统“大家族”生活的某种模拟，流露出她对前现代生活美学的眷恋和怀想。

前现代的空间布局孕育出典型的熟人社会，因其稳定不变，使人内心安适从容，更兼熟人社会以和为贵，伦理道德在规范个人德行方面效果显著，这便有了充溢全篇的融融之“情”。小说中，陈、林两家在亲子关系上虽有隔膜，但相互的爱与关怀从未缺席；三坊七巷中的邻居往来频繁并共同守护弃婴林恩馨的成长；林山和潘玫、陈雨帆和林恩馨、王文风和何霞的相爱相守令人动容；更主要的是，陈家祖厝中陈荣顺与妻子赵惠兰、陈氏夫妇与租客以及租客相互之间，都能够和睦相处、相互关心。这些天南地北而来的租客，各有其秉性、遭际和行当，却都在这个模拟的大家族空间里体会到善意和幸福，即便最善于钻空子的“坏人”吴新叶也被感化、弃恶从善。这种情感共同体由前现代空间构造而成，沉淀于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情感结构之中，而现代都市是追求速度和效率、人际边界清晰的陌生人社会，两相比较，坊巷空间无疑更具吸引力。因此，《情暖三坊七巷》表征的正是一代网络原住民对传统中国民间情感的缅怀与回望。

当然，模拟的“大家族”终归只是模拟，它不太可能是所有人共同的归宿，但作者以“情”为核心，消弭了大家族中的权威等级结构，消弭了“房东—房客”之间的阶层差异，也消弭了众人之间的地域和文化差异，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质朴的民间情感之原乡，这与《武林外传》《爱情公寓》《欢乐颂》等围绕生活空间建构的情感乌托邦异曲同工，不失为现代都市人对和谐情感关系的美好愿景，也给读者带来有效的情感抚慰。

在前现代空间构造孕育出的前现代生活美学中，“慢”是其另一特质，这一点在小说的叙事节奏上有直观的体现。网文的主流叙事追求“爽”点密布，讲究情节的急推进、强转折，姚璎则反其道而行之。小说从清晨五点半陈荣顺蹑手蹑脚去买菜开始，好似一路长镜头跟拍，展示这个福州好男人从陈家祖厝出发，到达农贸市场，选菜买菜，回到家中，与租客打招呼……这是陈荣顺波澜不惊的一天，是三坊七巷中不急不躁的日常。作者耐心地叙述陈荣顺买菜做菜的细节，甚至饶有兴致地列出详细菜谱，形成了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同步，以缓慢的叙事节奏来同步舒缓的生活节奏。有趣的是，作品从2004年写起，恰在那时，韩剧《大长今》风靡全国，该剧制作精良、服饰考究，尤为突出的是它缓慢细腻的叙事风格，显示出在情节的戏剧性基础之上，生活细节所具有的文化魅力。当然，2004年的中国正在高速发展，时代的节奏非但不慢，反而快得令人激奋和眩晕，《大长今》的出现提醒着，中国文化若要更好地彰显魅力，也需要有慢节奏的发掘和充分的细节呈现，《情暖三坊七巷》的“慢”应当也有相似的美学追求。在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慢”是一种冒险，想想短视频应用是多么厉害，让人目不暇接，只因为“慢”会导致疲惫和精神涣散；想想传统纸质文学，在它的创作一出版—阅读程式中，“慢”或过多的细节意味着某种“不经济”的冗长（甚至篇幅太长会对读者构成阅读挑战），而《情暖三坊七巷》之所以能用“慢”的笔触描摹“慢”的生活，依赖于网络文学写作—阅读同步的生产消费模式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养成的写与读的默契，在逐章逐节的追更过程中，就连菜谱也是产出阅读快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情暖三坊七巷》才得以最大可能地保留前现代生活方式的美学质地，让故事的展开具有了切实的文化传统承托和细密的日常生活肌理。

特殊的空间构造催生出特定的情感结构，也催生出千姿百态的故事，紧扣古长安的里坊空间布局，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侧重发掘其功能性特征，演绎出了悬疑的探案故事，而姚璎的《情暖三坊七巷》则在关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通过记录三坊七巷的改造历程，探寻复归民间情感是否可能的问题、探寻现代都市形态与古老文化和传统生活和谐共处的问题。当然，对于城市规划建设而言，古城改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此，官场、商场、情场、阴谋、阳谋都可能成为文学表现的切入口，而作者以“情暖”为基点的叙事则不乏臆想之处，但如果理解了作品的关切所在，跟随作者的叙述，体察城市空间变迁如何与个人生活血肉相连，探寻从形制到文化、从建筑到情感的动态平衡，思考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的问题，则不难理解小说的用心，并会从中大受启发。